

中国周边地区经济竞合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全毅 杨立冰*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合关系出现了新态势。本文认为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与政治角逐是影响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积极推动和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既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挑战,又是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战略措施。

【关键词】中国周边地区 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6)05-0011-06

一、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合作新趋势

亚太地区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沿三个层次展开:

一是多边合作机制:从1965年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提出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到1989年11月亚太地区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和东盟等12国的27位外交、经济(贸易)部长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这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从民间论坛活动进入官方性质的政策推进阶段。特别是1993年西雅图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政府推动得到强化。1994年通过《茂物宣言》,提出APEC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1995年推出《大板行动议程》,成员们提出了各自实施自由化的“首次投入”方案。1996年提出《马尼拉行动计划》,各成员开始实施“单边行动清单”。1997年温哥华会议确定渔业、林业、能源、玩具、医疗设备、环境产品和服务、珠宝、化学品、电讯等9个部门提前实现自由化。但是,这些倡议与行动计划在1997年东亚地区遭受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挫折。

二是局部经济圈:所谓局部经济圈是指地缘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的相邻国家间,或以整个国家或以一个局部地区参加小范围然而更紧密的国际经济合作。由南而北依次为“成长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尼的廖内群岛),泰铢经济圈(泰国、柬埔寨、老挝),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华南

经济圈(中国的香港、澳门、广东、福建、台湾),黄海经济圈(中国华东地区和辽宁、韩国、日本九州),图门江开发计划以及东北亚经济圈(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韩国、朝鲜、日本、蒙古)。这些分属不同国家且相邻的州或省已由频繁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人员跨国流动联系起来,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形成紧密的国际分工与经济联系,完成了功能性一体化,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特征。

三是双边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对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探索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在1965年8月31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签署了澳新自由贸易协定,1977年东盟五国签定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议,1983年澳新签定紧密经济伙伴协定,1988年6月2日美加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扩大为包括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即NAFTA)。进入21世纪APEC成员中只有东亚的中、日、韩以及中国的港澳与台湾地区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双边自由贸易区的选择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经济合作新亮点。

二、中国周边地区的大国竞逐与热点问题

综观全球,在当前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各方特别是大国的角逐加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扩展,拉美、非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区域合作步伐明显加快,

*全毅:福建社会科学院 亚太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杨立冰:福建社会科学院 亚太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正在力争主导亚洲经济合作进程。大国在亚太地区的角逐既有经济的竞争，更有政治的图谋。

首先是经济的竞争。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各国都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争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与市场潜力最大的地区，又是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理所当然成为各国竞逐的场所，成为全球 FTA 的热点。

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不再漠视自由贸易协议，实现了多边、区域和双边并举的战略转变。早在 1985 年至 1988 年就分别与以色列和加拿大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93 年又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999 年 WTO 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使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新一轮谈判的希望落空，美国转而重视双边 FTA，以便通过双边自由贸易促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深入。1999 年 APEC 奥克兰会议期间，美国同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商讨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2000 年 10 月与约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又与新加坡和智利开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02 年，美国先后与中美洲五国共同体及摩洛哥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截止 2004 年 4 月，美国已经签署了 10 个双边 FTA，涉及 15 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在 2005 年推动包括南美在内的 35 国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美国还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目前，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都在积极酝酿与谈判之中。美国还利用反恐战争取得中亚军事基地之机，积极运用经济援助与合作向中亚地区渗透。美国战略的转变当然不是为了凑热闹，确保“贸易帝国”的地位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角。目前，一个遍布全球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和区域 FTA 网络正在筹划和形成之中。

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积极倡导与推动者，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却落在后面。早在 80 年代日本向美国提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因美日贸易摩擦被放弃。日本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 2002 年 1 月与新加坡签署的《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2002 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盟五国及澳大利亚期间，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会谈时，说明日本对东盟外交“新理念”和“小泉构想”。所谓小泉构想，就是以“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为样板，包括自由贸易在内，与东盟在广泛的领域缔结“一揽子经济连携协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中国、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一个“共同行动共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目前日本已经与泰

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正在与韩国、墨西哥、智利、意大利、南非、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日本 EPA 在全球的总体战略布局是，以东盟、韩国为立足点扩展亚洲，利用墨西哥打入北美，依靠巴西和南非分别进军南美和非洲。日本设计的经济合作协定充分体现了全球性、战略性和灵活性。

韩国也在积极谋求双边自由贸易谈判。1998 年 10 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访问日本期间，提出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1999 年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 21 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部门的合作以及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和 WTO 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展开合作。但通过研究，韩国发现日韩自由贸易对韩国不利，韩国政府暂时搁浅了日韩自由贸易。但双方都没有放弃既定的目标，作为走向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双方已于 2001 年 12 月达成日韩投资协定。虽然金大中总统最早提出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但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却是韩国——智利自由贸易区（2003 年 2 月 6 日）。与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韩国也积极推动与东盟 10 国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谈判。

中国政策的转变：8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参加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作为结果中国终于在 2001 年 11 月加入 WTO。而对机制性较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持谨慎态度。但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转变了战略。到目前为止，中国几乎全部参加了亚洲的 40 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率先与东盟达成并积极筹建自由贸易区，第一个以非东盟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首倡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总理朱镕基在 2001 年 11 月 6 日新加坡 10+3 非正式首脑会议上，突然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10 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而在 2002 年 11 月 4 日，朱镕基总理与东盟 10 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在加入 WTO 后，将战略选择转向构建区域经济集团。

鉴于已有新加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等多个国家或集团希望与我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正本着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与上述国家有选择地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尽快构筑起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

东盟的新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东盟先后将越南

和老挝、柬埔寨、缅甸吸收，扩大为东盟 10 国，同时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1992 年 12 月东盟决定在 2008 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1998 年又决定提前到 2002 年，即老成员在 2002 年，越南于 2003 年，其他成员于 2005 年建成自由贸易与投资区。2000 年 10 月 6 日，东盟 10 国经济部长与澳新两国经济部长磋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目前，东盟与 CER 正在协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在 2005 年前；文莱、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在 2010 年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 2015 年。

东盟不仅接受中国与东盟在 2010 年建立自由贸易的建议，而且对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建议也持欢迎态度。还希望在 3 个 10+1 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早在 1990 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与欧盟和美加贸易集团抗衡，后来改称“东亚经济论坛”。这是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由来。因为美国的反对，日本消极，论坛未能启动。东盟在 1995 年曼谷首脑会议上提出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设想，继续推动东亚经济论坛的构想。1997 年底，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999 年第 3 次 10+3 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亚合作的目标与领域。2000 年 5 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政会议上缔结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货币互换和回购的“清迈动议”，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史以来整个世界首次向 3 大板块格局转变。此后 2000 年 11 月，在举行 10+3 首脑会议的同时，还建立了 3 个 10+1 双边首脑会议机制，并设立了相应的部长级和工作层会议机制。各国领导人就东亚合作达成共识，并确定了包括经济、货币、金融和安全等 8 个方面的重点合作领域。2001 年 11 月在东盟召开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以 10+3 为基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尽管这些构想的实行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印度在经略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将眼光转向东亚地区。2004 年 1 月 6 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7 国签署南亚自由贸易框架协议。同年 2 月 7 日印度与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不丹 6 国决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印度还向东盟、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表达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的意向，企图跻进东亚 10+3 体制。

俄罗斯的战略重点是巩固独联体市场，与独联体国家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经济一体化。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拓展中亚和东亚地区市场，目前，俄罗斯已经明确输往东亚的石油管道优先经过中国，然后通

往太平洋沿岸港口输往日本等国。

其次是政治的角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竞争无疑会反应到政治角逐中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异彩纷呈，除了对市场资源与能源的角逐外，当然还有政治角逐。

美国、日本是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巩固和提高其优势地位是其主要战略利益所在。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他们正在资源与市场方面对发达国家形成激烈的竞争。他们的发展动向理所当然地会引起美、日等国家的关注。维持现状的大国为了阻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力图以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来制约后起大国，迫使后起大国在战略上就范；维持现状的大国在后起大国的周边地区通过跨境市场的连接和融合，造成这个大国的经济离心倾向，最后导致政治上的解体。

因此，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自然成了美国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心腹大患，不时地抛出中国威胁论，特别是近日来势汹汹的“敲打中国浪潮”，突显出美国对中国崛起日益加剧的焦虑不安。尽一切可能延缓甚至控制中国的崛起成了美国“精英”重要的对华战略和策略。

大肆渲染能源威胁，要求人民币升值、操纵世界油价市场，已经成为美国有意识的挤压中国经济增长瓶颈的战略工具。在美国敲打中国的同时，还不时看到其盟国日本的身影，中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由日本新日铁与三家世界铁矿石巨头达成的铁矿石涨价 71.5% 的协议，让我们看到的是日益强化的美日联盟中日本遏制中国的苗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利用技术经济先进，强化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新兴产业进行“专利围剿”，挤压其生存空间。日本为了排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确保其经济领先地位，正在极力向美国学习，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战胜中国制造。

进入 21 世纪，美国新保守主义战略家们设计的地缘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在亚洲建立“预防性遏制”网络：强化以美日安保同盟为核心的亚洲国家体系，推进以关岛为中心的太平洋前沿部署，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扩大其力量存在和军事准入；提升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控制与石油储藏资源和管道及海上航线相关国家和地区，包括中东、中亚里海和南中国海地区；尽快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核武器从战略威慑战略调整为“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手段。尽管美国的这一战略部署被“9·11”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所打断，但是，美国还是借用反恐和防止核扩散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挑起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取得全面插足中亚、中东和东亚事务、控制石油资源，造成挤压中国与俄罗斯战略空间

的战略优势。目前,正在利用伊朗核问题,企图改变伊朗的政治生态,进而控制伊朗的能源命脉。

东盟之所以成为大国竞相追逐的热点,除了其本身的能源与资源丰富外,马六甲海峡是重要的国际战略通道。美日通过加强与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削弱中国对它们的吸引力。

利用台独势力和台湾问题是美日联合遏制中国的又一杀手锏。美日强化安保同盟,不断强化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将台湾海峡纳入其联合防卫的范围。不断渲染中国军力的威胁,敦促台湾当局购买美国武器,除了军火商的经济利益外,主要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石油开采方面的挑衅,也是日本牵制中国的主要战略工具。

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以及围绕中国周边地区进行的市场与政治角逐,构成我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严重挑战。

三、努力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

(一) 实现和平崛起必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似乎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铁律”。正是出于对这条“铁律”的担心,“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就没有中断过。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带来激烈的竞争,并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为打消各国的疑虑,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明确自己的发展路径:即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论”首先是由专家提出概念、总理谈要义、高层定战略而最终形成的。2003年11月3日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项要义”: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时间,恐怕要几代人

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

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首先选择了融入现行世界体制和秩序(比如加入WTO),既参与全球化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中国不依靠对外扩张和军事对抗崛起,而是在市场竞争与合作中与各国实现共赢;中国的崛起将有别于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引起战争的做法,即创造共同利益而非扩张与掠夺,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与人们以往的经验都不相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和平、发展和机遇,意味着合作、共享和双赢。中国倡导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不挑战现存秩序,而是通过参与调整和改革,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努力维持大国关系的稳定,寻求大国之间新的平衡,扩大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其次,实现睦邻友好、亲仁善邻,积极营造和平崛起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精髓所在。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的就有15个,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不断发生影响。我国周边地区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形成的不少热点至今尚未彻底解决。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关系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引进外资的70%以上。周边地区也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我国对周边地区的投资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对世界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坚持睦邻友好、与邻为善,不断加强增信释疑与互利合作,巩固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开拓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就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内容。

(二) 积极参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所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经济集团会发挥更大优势的国际市场。随着我国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突显,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国际上针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中外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3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高达356起,2004年,又有16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生反倾销、反补贴摩擦、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及金额30多亿美元。而与我国贸易摩擦最多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欧盟、日本、土耳其

其、韩国、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如果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个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某项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产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因此，中国企业要走出困境，突破包围圈，仅加入 WTO 还不够，必须在构筑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体制方面作出努力。如果说中国加入 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应是一项基本战略，那么加强双边或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应该作为优先策略。

（三）中国加强区域自由贸易的战略与策略

我国 1980 年代提出建立“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在内的中国经济区”设想；2000 年 11 月我国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缔结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最近著名学者胡鞍钢又提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设想。鉴于大范围的区域贸易协定谈起来比较困难，我国在寻求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上应转变策略，从我国战略利益考虑，从比较容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或多边优先领域的经济合作谈起，为全面参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学习经验。

中国入世后，首先要精心营造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经济合作新架构，即应着力促成以粤、闽、港、台为中心区域的南中国经济圈，大力促进这一区域经济合作、互补关系的快速攀升，使之成为亚太经济圈中增长最快的“晶核”，北牵日本，南引东盟，借以提高中国大陆在亚太经济区乃至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目前，祖国大陆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内地与港澳自由贸易区是一国两制原则下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关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相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组建自由贸易区更易操作和协调。只是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因政治原因还难以展开。为此，要稳健处理好台独问题。目前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在运行之中，通向中国经济区的内地与港澳台的经济区域整合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给港澳地区带来显著的好处，也增强了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2005 年 5 月以来，随着台湾地区在野党相继访问大陆，并就建立两岸经济共同体达成共识。岛内工商界以及在野党强烈要求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使台湾当局面临着强大压力。连宋代表的政党对当局的压力比普通民众产生的压力更大。如果台湾当局逆势而为，将可能被在野党取代。因此，今后台湾政治对两岸发展经济合作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小。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创造一个拥有 17 亿消费者、近 2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

值、1.2 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从而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按照人口计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这也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石广生语）。据中国与东盟双方专家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给双方带来可以预见的经济利益。由于关税降低（在未来 5 年，中国对东盟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将下调 34—47%），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需求将每年增加 10% 以上。

同时，可以避免与东盟国家产生恶性竞争。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电子产品以及某些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激烈竞争。如果听任市场力量的自由竞争就会两败俱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类产业的协调和分工，就可以为双方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虽然中国与东盟 10 国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但双方都认识到，由于中国——东盟之间的竞争多于互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达成全面协议有一定难度。一些国家（比如泰国）于是同时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途径。因此，不如从国别比如新加坡或泰国等开始谈起，为扩大谈判取得经验；其次，也可以先就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尽快启动谈判并达成协议，待取得成效后继续扩大。

第三，中国与中亚四国（俄、哈、吉、塔）等国签署了上海五国协定，并在 2001 年 5 月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诸国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是我国理想的能源进口基地，通过能源一体化协定可以确保我国能源供应。第 2 条欧亚大陆桥横跨我国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可以成为中国东部地区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的桥梁，也是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及东亚市场的重要媒介。由于中国穆斯林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亚、西亚地区联系密切，中国古带丝绸之路是联系中国与西亚的桥梁。因此，即使在海运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中国仍然可以沿着这条古代的丝绸之路拓展西亚市场。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已解决了边界争端，建立了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2001 年 9 月六国总理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赋予“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使命。目前，无论从区域经济合作目标，还是从投资贸易便利化进程看，都永远落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组织。但是，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应当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向货物、资本、人员以及信息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使各国的经贸合作无障碍地进行的自由贸易区方向前进，并发挥

新疆实验区的作用。

第四，确立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谈判策略和优先领域。为了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2003年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同意就建立三国FTA进行可行性研究。应该说中、日、韩之间的经济互动与产业分工程度远比东盟+中、日、韩要高，建立自由贸易区，创造的效益也会比东盟大。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近日就日本与各国的FTA谈判战略及效果进行分析时认为经济效果最大的是中国，与新加坡、墨西哥的FTA效果均有限。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的分析认为从分工利益的经济角度讲，中日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最为可取，但在政治上最难实行。这是因为即使撇开农产品的问题，日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等）会持反对意见，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会加以反对。他认为中日两国都是大国，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80%。如果中日两国（能效仿战后的法德）先行一步，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他的亚洲各国也会争先恐后地积极参加，从而大大地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责任编辑：娟子）

参考文献：

- [1] 朴若谷：《世界贸易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贸易论坛》2005年第2期。
 [2] 全毅：《亚太地区双边FTA新浪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3] 于艳君：《积极营造和平崛起的周边环境》，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编《2005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 《日本内阁府认为缔结中日FTA的经济效果最大》，《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测算对象是针对与日本正在进行谈判和将来有可能谈判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结果显示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效果最高的国家是中国，高达0.5%；东盟为0.24%；已经缔结FTA的墨西哥和新加坡分别为0.24%和0.002%。分析认为FTA的确会给日本农林水产业带来负面影响，并将打压农林水产业的GDP，与美国缔结FTA农林业会减少3.8%，与澳大利亚缔结则会减少1.7%。综合对GDP和农业影响分析认为与中国、欧盟、韩国缔结FTA具有较大正面影响，与美、澳则具有较大负面作用。
 [5] 马玉安：《东亚经济一体化应以中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轴心》，《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9月27日。
 [6] John Wong & Sarah Chan: "China-ASEAN Rel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an 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2001, 9, 20-23 中国厦门“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The New Trend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 Competi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Quan Yi and Yang Libing

Abstract: As the strengthe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regionalization from 1990S, the new trends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round China emerged. The bilateral-cooperation is springing up while multi-cooperation is at stagnate. This paper think that the great countries around china strive for economic profit and politic impact is a big block to the integration of Asia and China. To promote and joint the Coars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is China to countermeasure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 regionalization, and also the strategic measure to construct peaceful environment for its developing.

Key words: The Countries Around China;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Peaceful Developing

（上接6页）Monetary Union. London: CEPR,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Quah, Danny.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Growth: I.

Persistence in Cross-Country Dispariti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992.

The Empirical Study of East Asia's Economic Convergence

Cheng Chuanhai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and New Classical Growth Convergence, This Essay Analyses East Asia's Convergence Empiricall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Nominal Convergence According to Maastricht Treaty, The econd is Real Conergence Test Including Real Income Per Capita's α -convergence and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The Third is Structural Convergence. The Empirical Test Results Indicate East Asia's Economy Show Some Convergence Recently but not distinctly. East Asia Have Long Road to Reach Monetary Integration.

Keyword: East Asia; Nominal Convergence; Real Convergence; Structural Convergence